

## 在基督教與佛教之間： 黃春甫、黃涵之父子的醫學慈善活動

高晞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在中國近代慈善史中，黃春甫、黃涵之父子皆以醫療慈善揚名，但他們分屬不同領域。黃春甫為上海第一家基督教醫院仁濟醫院的首位華人西醫，以醫療慈善聞名晚清，頻登《申報》，受醫學史與傳教史研究者重視。黃涵之則為近代江南地區佛教居士領袖，涵之自稱從事醫療慈善活動乃至為官之道皆受父影響。本文探討了兩人慈善模式、理念與角色，分析兩問題：一、黃涵之為何轉向佛教並成為江浙佛教居士領袖，並引領醫療慈善？二、父子慈善活動內容相似，角色與方式卻異，通過此個案，研究佛教慈善近代轉型與基督教慈善模式的關聯，比較兩者的理念異同，以揭示佛教醫療慈善的現代性與社會意義。

**關鍵詞：**黃涵之、黃春甫、醫療慈善、中國慈善史、中國近代宗教

## 一、引言

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慈善史的書寫中，黃春甫(1833-1911)與黃慶瀾(1875-1961)父子分處在不同領域。黃春甫是上海第一位華人西醫生，在上海第一家基督教醫院——仁濟醫院擔任醫生，長達43年(1854-1897)。因這段西醫從業經歷，受到中國近代醫學史和教會史研究者的重視，<sup>1</sup>他所從事的醫療慈善活動在晚清上海成為美談，屢屢登上《申報》。1854年4月27日，黃春甫與一位被教會收養的中國貧窮女孩沈氏結婚，組建滬上最早的基督教家庭。<sup>2</sup>

然而，這個基督教家庭的唯一繼承者黃慶瀾(1875-1961)是卻成為江南近代佛教居士領袖，一度出任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江蘇佛教聯合會暨江浙佛教聯合會常務委員，上海特別市佛教會執行委員，佛教淨業社副社長、世界佛教居士林理事會等職。他的慈善活動更多與地方政府和佛教事業有關，主要集中在上海以及他擔任溫州甌海道道尹和寧波會稽道道尹期間(1918-1924)，1927年他曾任上海特別市公益局局長，1937年出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教災會(簡稱慈聯會)副主任，又兼任難民賑濟委員會主任。<sup>3</sup>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慶瀾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佛教淨業社社長，曾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特邀代表、市政協委員。黃氏父子留存於世的名望，皆源於他們

---

<sup>1</sup> 臺灣學者蘇精在其專著中有專章介紹黃春甫的事跡，見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90-221頁。

<sup>2</sup> 方行、湯志均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11頁。據蘇精先生研究，沈氏與黃春甫婚後不久，便進入教會學校任教，負責教導中國女生。1857年，沈氏領洗入教，之後一直在教會學校任教。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前揭)，第196-197頁。

<sup>3</sup> 陳姣燕《民國時期黃慶瀾慈善事業研究》，杭州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4頁。

在醫療慈善領域為社會作出的重要貢獻。黃慶瀾自喻自己從事醫療慈善活動乃至為官之道都皆秉承父親之志：其理念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則恪守“仰承先志，嗜善如命，凡慈善事業無役不與為己任”的濟世精神；二則恪遵“服官以來，一以父師訓型為從政之本”的治政原則，<sup>4</sup>以父親教導的仁德之心為其施政根基。

但在近代中國慈善界，黃涵之的影響力遠勝其父。

有鑒於學界對黃氏父子的研究已頗具成果，<sup>5</sup>關於黃春甫研究多集中在其醫療活動和醫學教育思想，而對黃涵之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其地方政績和慈善活動兩方面。本文嘗試另闢蹊徑，以醫學慈善為核心，探討作為基督徒的父親與佛教徒嗣子之間慈善活動的承繼性及差異性，考察晚清民國期間在的西方慈善理念東漸的背景下，上海及江南地區士大夫群體的慈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本土性和時代性。

## 二、黃春甫： 基督教之醫療慈善活動的實踐及其局限性

黃春甫，正名黃錚，春甫為字。在晚清民國間的教會醫院報告中和上海媒體報道上，均以字行世，正名鮮有出現，基本不為人知。黃春甫祖籍江西，在江蘇省松江府成長，1833年6月29日出生，卒於1911年，終年78歲。<sup>6</sup>受兄長黃吉甫影響信奉基督教

<sup>4</sup> 黃慶瀾《甌海觀政錄·自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一輯》(303)，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7-8頁。

<sup>5</sup> 關於黃春甫的最新研究有蘇精《西醫來華十記·上海第一位中國人西醫黃春甫》，第190-221頁。關於黃涵之的研究有陳姣燕《民國時期黃涵之的慈善事業研究》(前揭)；陳明華《道德、慈善與政治：民初黃慶瀾的甌海道之治》，《浙江檔案》2020年第8期，第36-40頁；安永娜《西醫入滬：地方性在全球現代醫學中的典例》，《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第26-31頁。

<sup>6</sup> 張在新《名醫黃春甫先生事略》，《中西醫學報》1912年第12期，第1-2頁。



圖 1：黃春甫像

並加入教會。據蘇精先生研究，黃吉甫少年赴英國。<sup>7</sup> 1855 年回到上海，1856 年受洗，1856 年 7 月起在英國倫敦傳道會的上海佈道站工作，先在城內教堂講道，後轉至英租界仁濟醫館。

1850 年，17 歲的黃春甫來到上海，入倫敦會上海站男生寄宿學校學習西學，課程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神學、萬國史和數學。在完成預科學習之後，1853 年，黃春甫進入倫敦會上海仁濟醫館當學徒，跟隨醫館創始人、英國醫學傳教士維頓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學醫，與仁濟醫館結下不解之緣。同年黃春甫受洗，自此，投身於醫療事業與慈善工作，開啓了其人生新篇章。

上海仁濟醫院是英國倫敦會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家教會醫院，初名仁濟醫館，20 世紀初更名仁濟醫院。醫院早期向上海市民提

---

<sup>7</sup> 韓雅各 (James Henderson)《上海醫院述略第十四冊》，葉 2 下。

供全免費醫療，借助醫學慈善活動，在上海市民中傳播基督教，同時為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工部局提供社會性醫療服務。<sup>8</sup>

黃春甫在仁濟醫院的身份由學徒、藥劑師逐步晉昇至住院外科醫生，最後成長為能獨擋一面負責醫院治療的醫生。基於其華人身份的專業優勢，黃春甫時常代表醫院履行工部局委派的特殊職責：包括擔任租界驗屍官、協調巡捕房醫療糾紛案件、深入華界為市民實施牛痘接種，並在疫情期間為上海市民提供醫療救助。

在仁濟醫院學習西醫知識的同時，黃春甫全力參與醫院的慈善救助活動，感同身受地瞭解了基督教的慈善理念和方法，並賦之實踐，在華人社區獲得較高讚譽。

1864年，清軍武官馬天魁在松江府婁縣泗涇鎮參加對抗太平軍之役時，被槍彈擊碎脛骨，經中醫治療無效，慕名來到仁濟醫館尋求英醫韓雅各 (James Henderson, 1829-1865) 治療。不巧，韓雅各已回英國結婚，醫館事務委託黃春甫全權負責，病人在黃春甫醫治下。兩月後便行走如常，而身上另一處深可見骨的大腿槍傷也告痊癒。馬天魁深感黃氏之恩：“上達國恩，下掃逆氛，皆出自春甫所賜！”於是，他向仁濟醫館贈送了“功贊耶穌”的匾額。

因其醫術和社會醫療的慈善活動，黃春甫成為晚清滬上名醫，上海《申報》曾以《好行其德》為題介紹他救治交資助病貧窮病人的事例，亦有患者在《申報》自費刊登啓事贊頌黃春甫醫術“收生神速”。<sup>9</sup> 19世紀80年代之後《申報》時常發表討論中西醫學異同的言論文，為推廣西醫造勢，在《論西藥將盛行於中國》一人

<sup>8</sup> James Henderson, *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anuary 1st 1864 to December 31st 1864*,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5, p. 3.

<sup>9</sup> 《收生神速》，《申報》1882年7月24日，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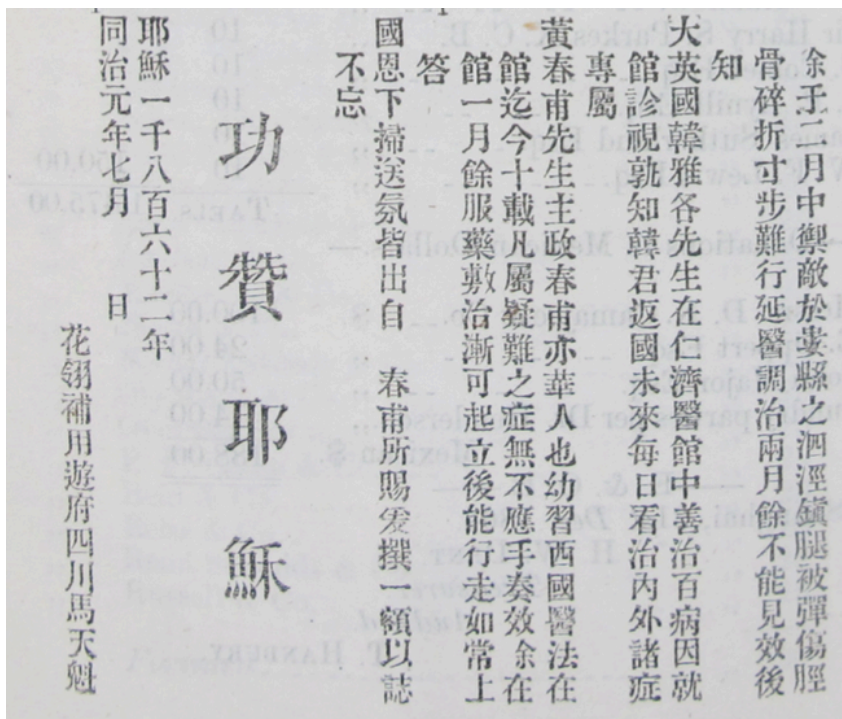


圖 2：馬天魁贈送匾額

便以黃春甫的治療術為例，論證西醫的優勢。<sup>10</sup> 晚清著名思想家王韜 (1828-1897) 曾在《申報》上賦詩讚道：

泰西醫術能者誰？黃君所造當今稀。率循古法由實測，剖析藏象殊精微。三十年來活人眾，其學愈工心彌慈。刀圭既與時流異，微名何愧稱醫師。我識君時年正少，壹志岐黃矢久要。飛騰君喜已成名，飄零吾嘆寡同調。<sup>11</sup>

<sup>10</sup> 《論西藥將盛行於中國》，《申報》1895年10月2日，第1版。

<sup>11</sup> 王韜《題黃春甫垂釣圖》，此詩初載於《申報》1882年6月24日第3版，後以《題黃春甫主政垂釣圖》之名收入王韜《衡華館詩錄》5卷附存1卷，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5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96頁。

黃春甫從醫療慈善的執行者，逐步成長醫療慈善的主動推進者，關於他的醫療慈善工作，蘇精先生已有詳細論述，<sup>12</sup> 本文不作贅述。僅略舉他所從事的慈善活動：

(一) 免費接種牛痘。在地方政府開設牛痘局擔任種痘師，同時，還在上海郊區開設分局，自己親自前往施牛痘。<sup>13</sup> 1874年12月29日《申報》記載道：

蘇松復於邑廟豫園開設施種牛痘之局，延江西黃春甫先生主之，迄今將及十年所種之孩已逾萬餘，未聞有因此夭折者。近來二三年內，上海隣縣各處，天行痘症因而夭折者，實繁有徒。若在上海四周數十里以內，曾種牛痘之幼孩，均未罹此禍也。可見牛痘之利，不已昭昭哉！特是其法極良，其功至大。<sup>14</sup>

(二) 疫情救治。疫情期間，黃春甫都主動在《申報》上時續刊登廣告，告誡市民去醫院接受免費治療，治療霍亂：

霍亂之症，每起於夏秋之際，醫治稍緩，勢必無救，甚可憫也。現悉本埠，業已漸起是症。本館向有，靈妙藥餌，歷年以來，試之甚效，危而轉安者，實屬甚眾，故用敢自信。如患此者，不論何時，宜速送來醫治。毋猶豫不決，以致自誤。況敝館為救治起見，凡來就醫者，不取分文，實可共諒。並祈閱報諸君，更相傳

<sup>12</sup> 蘇精《西醫來華十記·上海第一位中國人西醫黃春甫》(前揭)，第190-221頁。

<sup>13</sup> 張在新《名醫黃春甫先生事略》，《中西醫學報》1912年第12期，第1-2頁。

<sup>14</sup> 《論牛痘》，《申報》1874年12月29日，第1版。

佈是幸。<sup>15</sup>

目前吊腳痧，傷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務將病人趕緊送至敝醫館醫治，或可拘回。不拘何時，均可送來，無不照收，善為救治也。

仁濟醫館黃春甫啓<sup>16</sup>

(三) 賑災活動。晚清中國天災頻繁，上海仁濟醫館成為在滬外僑賑災捐款的主要場所，黃春甫多次參與外僑的賑災救助活動，如 1877 年至 1879 年山西賑災，1880 年山東賑災，1890 年至 1891 年順天賑災，1892 至 1893 年山西賑災。

(四) 支持贊助紅十字會活動。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戰火燒到東北，《申報》在報道北方戰事的同時，介紹了在西方社會方興未艾的紅十字會戰場救護行動：

甚矣，軍士之苦也！當夫荷戈執戟，列隊而前，道路崎嶇，日行百里。熱則塵砂被體，汗血淋漓，冷則雪窖冰天，膚坼指墮。有冤不得訴、有苦不得號，在稍有仁慈者，已見而惻然，心有不忍及至。戈矛林立、砲火喧天、肉薄血飛、赤地千里。每一鏖戰，屍體縱橫，斷脰殘肢，烏鴉爭啄。即幸而不死，而瘡痍遍體，鮮血交流，藥彈及身，深入筋骨，倒臥於路，痛不能行，輾轉哀號，慘難入耳。無論戰而敗，受傷兵卒，固必累百盈千。即使我武維揚，全獲大勝，而當奮不顧身之際，安保不中槍著彈，痛苦淹煎此？西國紅十字會中人，所以必不避

---

<sup>15</sup> 《仁濟醫館來信》，《申報》1888 年 8 月 9 日第 3 版。類似的投書至少還刊登於《申報》1886 年 9 月 11 日、1887 年 7 月 8 日、1889 年 7 月 13 日、1890 年 7 月 24 日，以及 1890 年 8 月 5 日等。

艱危，爲之療治也。紅十字會者，皆各國好善之士；或精於醫術者，糾集同志，製備刀箱藥餌之屬，隨營前進，遇受傷者則醫之。其人裝束，略如武員，腰佩長刀，手執小方旗，旗上書一紅十字，衣之右袖，亦如之。背負小藥箱，出入於槍林砲雨中。人見其爲行善之人，不之禁阻。<sup>17</sup>

受歐洲紅十字會救援活動影響，在華傳教士在營口發起組建紅十字會醫院。消息傳到上海，1895年由以倫敦會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為首的在滬傳教士群體在仁濟醫館，為籌建紅十字會醫院發起募捐，黃春甫個人捐出20元，是捐獻最多的中國人。1904年華人沈敦和在上海組建萬國紅十字會，成員由華人富商、士坤和外國僑民共同構成，成立初期，黃春甫是其中出力最多的中國人。1908年時，商約大臣呂海寰(1842-1927)等奏保紅十字會有功人員，黃春甫以創始及辦事人之一而獲賞配戴中國紅十字會一等金質勳章。<sup>18</sup>

(五)創建育嬰堂和義塾，收留窮人子弟。<sup>19</sup>黃春甫從仁濟醫院和醫學傳教士那裡學到了西方的醫學、科學知識和慈善理念，切身體會到西醫科學的優勢。但他是學徒身份入行，沒有接受過完整的西醫學教育。因此，向華人學子傳授系統醫學知識始終是黃春甫的夙願，他曾設想建立一所可以同時教授中西醫學的學堂，為此，他甚至學習洋人慣用的募集方法，自籌到了一大筆資金，然而這一教育理想未獲得到仁濟醫院和工部局的支持而無法

<sup>16</sup> 《申報》1886年9月11日，第3版。

<sup>17</sup> 《勸助行營醫院經費說》，《申報》1895年2月10日，第1版。

<sup>18</sup> 《東督等奏保紅十字會名單》，《申報》1908年4月28日。

<sup>19</sup> 張在新《名醫黃春甫先生事略》，《中西醫學報》1912年第12期，第1-2頁。

實現，成其畢生憾事。<sup>20</sup> 他转而積極參與地方上的社會慈善活動，創建育嬰堂和義塾，收容並資助窮人子弟。

黃春甫的一生是基督教醫療慈善的實踐者和傳播者，他通過自身言行向上海市民展現了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善舉的西方慈善理念和實踐方法，儘管如上所述，他在醫療慈善領域作出了重要示範，但由於未接受傳統的儒學教育和正統西醫學訓練，加之個人文化素養的限制，其思想未能通過文字形式完整留存，致使後人難以系統地追溯其慈善理念的內在邏輯和思想脈絡。

黃春甫的醫療慈善思想在其子黃慶瀾（與沈氏的獨子）身上得到延續與發展。黃慶瀾秉承父親遺訓，日後成長為江南地區關注民生和社會福祉的地方官員和慈善家。值得注意的是，黃慶瀾的慈善實踐與父親一脈相承，其精神內核卻呈現出佛教信仰的鮮明特質，這種跨宗教的慈善傳承現象折射出近代中國多元文交融的時代特徵。

### 三、黃涵之其人及慈善活動

黃慶瀾，子涵之，1875年出生於上海。父親一生都在為西洋人工作，而黃涵之走的卻是一條中國傳統的仕途之路。幼年接受傳統教育，攻八股文，中秀才，是清末貢生。1897年考入南洋公學師範院，“光緒末年留學日本，考察政教工藝。”<sup>21</sup> 1907年回國後出版《東游日記》。

黃涵之回滬創辦上海南華書局、上海法政學校和三育中、小學堂等。1910年任湖北宜昌知府兼湖北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北洋

---

<sup>20</sup> 蘇精《西醫來華十記》，第197, 205頁。

<sup>21</sup> 《黃涵之先生小傳》，《海上名人傳》，1930年5月，第63頁。

政府時期，黃涵之一度參與到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曾任上海火藥局局長、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1913年當選上海市議會議員。<sup>22</sup> 1917年就任上海工巡捐局長，1918年被派任浙江溫州甌海道道尹，兼任甌海關監督，1919年12月至1924年11月就任寧波會稽道道尹。<sup>23</sup> 1925年任江蘇省善後委員會秘書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7月他進入上海特別市行政管理機構，出任公益局局長，負責上海地區民生食物營養問題、監督私立慈善機構等諸事宜，<sup>24</sup> 同時擔任公立上海醫院臨時主席。2個月後，黃涵之辭去公職退出政壇，專心投入佛教慈善事業。

黃涵之何時歸信佛教不明，原因也不清楚。其先後皈依諦閑法師(1858-1932)和印光法師(1862-1940)，法號智海，與印光弟子弘一法師(1880-1942)有過從。1919年他在甌海道任道尹時，對佛教的思想已有深刻體認，1919年8月3日他致信溫州佛教居士張雲雷(1883-1977)探討“佛教與現代科學”的關係，認為“且科學何所從出乎？則曰出之於哲學。抑知哲學何所從出乎？則實出之於佛學也。故佛學不獨為科學之祖，實亦為哲學之宗。”<sup>25</sup>

<sup>22</sup> 《市议会选举揭晓续志》，《申報》1913年7月16日，第10版。

<sup>23</sup> 1914年袁世凱政府公佈省、道、縣等地方官制，一省分為數道，全國划出93個道，改省觀察為道尹，管理各所轄各縣事務，隸屬省長。浙江共4個道，錢塘道、會稽道、甌海道，金華道。甌海道下轄14個縣，麗水、青田、龍泉、縉雲、景寧、慶元、松陽、雲和、宣平（武義縣柳城鎮）、遂昌、泰順、樂清、永嘉、平陽、瑞安、玉環。會稽道下轄寧、紹、台三府所屬各縣。1918年，黃慶瀾擔任甌海道道尹（主政官員），管14個縣。1919年至1924年寧波任會稽道道尹。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後廢道制。

<sup>24</sup> 《公益局》，《申報》1927年7月30日第13版。

<sup>25</sup> 張雲雷，名烈，浙江樂清石帆匯頭人。早年東渡日本，求學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張雲雷在浙江參與革命活動，1913年任浙江省議會議員，之後又參與“倒袁護法運動”。1918年在上海與同仁創辦《時事新報》，宣傳介紹並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滬期間張雲雷與印光法師結為師徒，又與弘一和諦閑法師等交往，皈依佛門。1922年返回故里創辦樂清虹橋居士林，1923年張雲雷與同仁在溫州開設甌海實業銀行。



圖 3：黃慶瀾像

他在會稽道道尹任職期間，公暇之餘常去觀宗寺聽諦閑大師講經，他還曾建議諦閑在寺內鑿放生池，並作《觀宗寺鑿放生池碑記》。<sup>26</sup> 他是濟生會早期會員，負責濟生會教育義務處，20年代，黃涵之已是江浙一帶著名的佛教居士。1922年，他將自己的佛教講義用白話文改寫為《初機淨業指南》，<sup>27</sup> 印光法師為之作序，李叔同一直將此作為向初學者的推薦之書。<sup>28</sup> 同年，黃涵之與上海佛教界名流施省之等，發起組織“上海佛教淨業社”，黃涵之擔任董事，他出錢出力，不落人後。1926年他與人聯合組織上海佛教維持會，就任上海佛教護國和平會理事。1927年，與上海佛

<sup>26</sup> 方祖猷《天台宗觀宗講寺志 1912-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29頁。

<sup>27</sup> 黃慶瀾《初機淨業指南》，上海：弘化社，1922年。

<sup>28</sup> 李叔同《李叔同的自我修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47頁。

教界名流施省之(1865-1945)、王一亭(1867-1938)等發起組織“上海佛教維持會”。同年他參加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任副委員長、同時兼任聯合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副主席，負責日常事務。<sup>29</sup> 1928年擔任上海中國濟生會副委員長。

黃涵之從事醫療慈善與父親有著密切的關係，“先師之訓曰遠利，先人之訓行善。”<sup>30</sup> 黃涵之初到溫州時：

余下車首以整飭風俗，擴張教育實業，提倡善舉為務，撰寫通俗文字十餘種，印數萬紙，分頒各縣。於戒淫、戒賭、戒鬥、戒訟，尤諄諄言之。此外勸孝勸貞節，勸桑、勸放生、勸種牛痘、勸植森林諸文，亦多出自手製，不計工拙，務盡其意。<sup>31</sup>

除了慈善理念深受父親影響，黃涵之的慈善實踐活動基本與父親的工作一致。

首先，支持並創辦施醫院，在溫州工作期間，每逢疫情，招募中西醫師免費為當地百姓服務。“本地素乏良醫，遂致救濟無術，目覩慘狀，良堪憫惻。現經入暑，轉瞬屆秋，知事思患預防，擬自行捐廉，延醫設局施診。”<sup>32</sup>

作為地方官員，黃涵之不僅在地方開設時疫醫院，同時自己捐俸施藥，

<sup>29</sup> 《黃涵之先生小傳》，《海上名人傳》1930年5月，第63頁。

<sup>30</sup> 黃慶瀾著《甌海觀政錄·自敘》，第8頁。

<sup>31</sup> 黃慶瀾《甌海觀政錄·自敘》，第7頁。

<sup>32</sup> 鄧家箴等《呈省長齊轉呈景縣知事擬酌撥公款補助醫局文》，黃慶瀾《甌海觀政錄》，第628頁。

戊午秋，疫厲大作，死亡相枕。藉道尹黃公聞之惻然，捐俸施藥，並派中西醫士，先後來吾邑，星夜診救，活者無算。其仁心仁政，求之今日，不可多得。<sup>33</sup>

先生時從上海購藥施診，整理育嬰堂，創設廣濟醫院多所，全活。<sup>34</sup>

他的行為被同道譽為“少展經綸醫國謀”。<sup>35</sup> 溫州醫士永嘉吳性健，曾參與黃涵之主持的醫學考試，考取“最優等”，之後被指派廣濟醫院施診，<sup>36</sup> 他在黃涵之離任時贈詩道：

門外屢常滿，壺中藥為捐，同醫和緩侶，世德谷城仙。  
(注：先德以醫名，公尤能世其學。自下車後，每值公餘，求醫者屢常盈門，公皆躬自診治，施捨藥料，歲費以萬金計，至於活人無算，通國之稱)<sup>37</sup>

由黃涵之的文章和公函可見，疫情期間，他會同時召募中西醫生為百姓治病。出身於基督教西醫之家的黃涵之卻對中國醫術與中國醫學更為推崇。疫情期間，他同時安排中西醫生共赴疫情救助，並多次採用傳統的、或民間的抗疫藥物發放給百姓，比如：午時茶、濟生丸、痧藥水等。在溫州創建醫院時，他則堅持以“不為良相，必為良醫，誠以‘上醫醫國，其次醫人’，醫固通乎相道者也，”為辦院准則，他甚至認為“西醫治病每經實驗用藥，各有

<sup>33</sup> 鄧家箴等《宣德縣去思碑》，黃慶瀾《甌海觀政錄》，第984頁。

<sup>34</sup> 黃慶瀾《永嘉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徐繼琪贈言》，《甌海觀政錄》，第981頁。

<sup>35</sup> 黃慶瀾《岐海鄭猷贈言》，《甌海觀政錄》，第973頁。

<sup>36</sup> 黃慶瀾《永嘉吳性健贈言》，《甌海觀政錄》，第972頁。

<sup>37</sup> 黃慶瀾《瑞安胡調元次王豫恂韻》，《甌海觀政錄》，第966頁。胡調元，瑞安鄉賢，開明人士；王豫恂，湘潭人士，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官。

專品，頗合中國古藥之法。”<sup>38</sup>

目前所有相關研究都未曾提及黃涵之是否會醫術，黃涵之曾自言“本道尹素重生命，慎選良方，劇中常施藥濟貧，已閱十餘年寒暑。”<sup>39</sup>由其同道的臨別贈言可知，先生“醫術通中外。(注：先生署中施中西藥品，遇有疑難要癥者，先生且親自診治)”<sup>40</sup>他在公職之餘親自接診病人，且可“活人無算”。

1918年，由他支持的“甌海醫院”設立，由“私人慷慨捐鉅資或多方張羅以維持之者，更為慈善界之盛跡美事。”<sup>41</sup>稱之為施醫院，施醫院之名稱原源自教會醫院，黃涵之認為：

中國醫學昌明由來舊矣。清室中葉，五洲交通，咸同之間，歐風東漸，申江一埠，沾化最先。時西人方設，仁濟醫院。先君子慨然曰：凡事當以實驗為可據，今中國醫家徒務理想，道則高矣，無乃之疏乎！於是發憤，精究西醫，主持院務者數十年，名盛歐浦。

在感慨父親之開創之貢獻後，黃涵之自謙無法繼承父親的業績。來到溫州後，當地紳士籌建組織醫院，“聞之深為甌民幸喜，亟盼事之速成。”<sup>42</sup>

其次，舉辦醫學考試。黃春甫深知中國醫學與西方醫學的明顯差異是中國醫學缺乏教育與考試制度，他曾一度努力希望推進

<sup>38</sup> 黃慶瀾《甌海醫院碑記》，《甌海觀政錄》，第848-851頁。

<sup>39</sup> 黃慶瀾《布告署擬設官醫考選醫士如期來署報名文》，《甌海觀政錄》，第281頁。

<sup>40</sup> 黃慶瀾《永嘉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曹元忠次王豫恂韻》，《甌海觀政錄》，第960頁。

<sup>41</sup> 萬竹友《評甌海醫院事》，《廣濟醫刊》1932年第9卷第7期，第8頁。

<sup>42</sup> 黃慶瀾《甌海醫院碑記》，《甌海觀政錄》，第848-849頁。



圖 4：甌海醫院

倫敦會和上海工部局設立醫學堂和醫學考試，終未如願。黃涵之認為“醫學為專門之學，未可掉以輕心也。”為此他表示，

本道尹現  
擬自捐俸項，  
於公署內設立  
官醫，診治貧  
病。甌邦人士，  
覃精醫術者，  
不乏其人，自  
應面加考試，

籍資選擇，為此通告周知。……以期選拔真才，並分別等次，給贈獎勵。<sup>43</sup>

黃涵之之所以強調醫學知識的質量，在於他一向尊重生命，並認為“醫之為道，本仁心以行仁術，以代天地施好生之德，為人民救垂絕之命者也。”他批評現世醫生不精醫術：

借救世之名，下殺人之手，撫心自問，其能安乎？  
譬之寇盜橫行，民不堪命，為長官者，宜妥籌勦撫之，

---

<sup>43</sup> 黃慶瀾《布告署擬設官醫考選醫士如期來署報名文》，《甌海觀政錄》，第 281 頁。

方以盡保衛地主治安之責。若更藉寇兵而盜糧，則小民之身家性命，有幸全者乎？醫之治病，猶官之治民也，生命攸關，豈容忽視？況名利二字，本屬於相連，盛名之所歸利，即隨之而至。然則即言利，亦當先求名；其所以能立名者，非有閔手成春之術不可；而所以能著手成春者，非熟讀方書，深明脈理，細心用藥不可。今諸君雖於醫理藥性，夙有研究之功，當不致蹈庸醫殺人之弊，然學問無窮，安有止境。……本道尹此次考試，原為慎重生命起見，惟思寒士生涯，尤須顧及。……醫為仁術，宜具仁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諸君以術救人，保全生命，即為兒孫造福之基，聖人之言，豈欺人哉！<sup>44</sup>

第三，施種牛痘。當年黃春甫通過在《申報》刊登廣告的方式，招呼鼓勵市民接種牛痘，並親自前往多個牛痘接種局施種。作為官員的黃涵之所作作為與其父異曲同工。1919年3月，黃涵之剛到溫州就極力推廣牛痘接種術，並充分利用自己手中之權力，多次宣佈訓令，要求當地官員推行牛痘。更為重要的是，他個人承擔疫苗購買的費用，自己從上海購買遞送到當地。

近來佈種牛痘之法，確已通行，惟本道尹通令各屬設局施種，係專為貧苦居戶，吝惜醫費不能普及起見。來呈所稱，尚多誤會，仰仍遵照前令，選派醫生，排定日期，分赴各鄉，巡環施種，並先期佈告周知。應需痘苗，

<sup>44</sup> 黃慶瀾《考取各醫生勅詞》，《甌海觀政錄》，第285-286頁。

如果並未往購，可由本道尹捐給，迅即妥籌覆奪，毋再延誤，切切此令！<sup>45</sup>

不僅如此，他特意撰寫了一篇白話文《勸種牛痘白話文》，在文章再次提到父親對他的影響：

我的父親在世的時候，還在同治元年，現在算起來已經有五十多年了。那個時候我們中國還不曉得種牛痘的法子，也不曉得種牛痘的好處。是我的父親第一個傳出來的，一年總要種到一萬多個小孩子。所以我曉得種牛痘的好處，是最明白的。我們家裡的人大大小小都種過牛痘的，沒有一個人出過天花，也沒有一個人耳聾眼瞎面麻的。<sup>46</sup>

依黃涵之的觀點，小孩子生病與大人有關，一方面是傳統的痘疹“胎毒論”，即小孩子的痘疹源自母親的胎血；另一方面，與生活環境有關係，“地氣又是很濕的，平常時候受的濕毒也就不少”。重要的是與人之品性有關，“一個總有發火動氣的時候，多發了火就變成功熱，熱就變成功毒了。像這樣種種的毒，多要傳到小孩子身上的。”<sup>47</sup> 通過牛痘接種術預防天花是近代醫學科學的最新成果，由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帶入中國，這項技術在江南地區的推廣與普及主要得益於教會醫院的大力宣傳與免費接種，在此過程中黃春甫有着不容忽視的貢獻，其子涵之雖然延續了父親

<sup>45</sup> 黃慶瀾《指令平陽縣知事呈覆調查種痘情形由》，《甌海觀政錄》，第 641 頁。

<sup>46</sup> 黃慶瀾《勸種牛痘白話文》，《甌海觀政錄》，第 643-644 頁。

<sup>47</sup> 黃慶瀾《勸種牛痘白話文》，《甌海觀政錄》，第 643 頁。

的工作和慈善觀念，但在他的實際操作中，卻在這項西來的最新科學技術中逐漸地融入了地方性知識，比如他回歸中醫傳統思維，不僅採納中醫的痘疹說之“胎毒論”闡釋天花病因，更由人性人品之角度分析病菌傳染的原理。作為佛教徒的黃涵之在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上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特殊觀點，他認為人身上有毒性，但動物如牛是乾淨的，

為什麼叫牛痘？因為種痘的苗是從牛身上取下來的，牛是畜生，沒有知識，沒有七情六慾的。並且挑選的好牛，所以沒有毒的。先在牛身上種了痘，等他發透了，取他的痘漿下來，就叫牛痘苗，很潔淨的，一些沒有毒氣的。<sup>48</sup>

黃涵之的動物觀呈現出佛教義理與近代科學認知中的獨特交融，作為虔誠信眾，他在闡釋人畜關係時創造性地融合佛教“不害”思想和細菌學知識，形成具有時代特徵的衛生倫理觀，將現代醫療實踐納入佛教因果體系，強調疫苗制备需“擇健牛、取漿淨”的技術倫理，暗合菩薩“善巧方便”的度化原則。這種跨學科的認知直接推動了其實踐轉向，1934年，他與葉恭綽(1881-1968)、施省之、王一亭等組織“中國動物保護會”，宣傳戒殺放生、保護動物。

第四、對溺嬰習俗的批評。民國時期的溫州依然有溺女嬰的惡俗，黃涵之對此深惡痛絕，發出《訓令龍泉縣知事整頓育嬰堂以救濟溺女惡俗文》，認為此是“最為慘惡業”。他相信“貧苦之

<sup>48</sup> 黃慶瀾《勸種牛痘白話文》，《甌海觀政錄》，第644頁。

家無力撫養者，溺斃之風，實所不免。救濟之法，自以整頓育嬰為最要。”但對溫州地區的育嬰堂調查之後，他說：

辦事之腐敗，經費之侵蝕，有不可收拾之勢。甚至寄養嬰孩，因病因飢而斃命者，月以數十計。誰非人之子？同是生命，忍坐視而不為之拯救乎？本道尹目擊，心傷難安寢。……編訂章程，派董接管，切實改良，一面將舊有款逐一清理。……盡一分心，即為自己之子女積一分德。<sup>49</sup>

將溺女嬰的俗習，視作是社會惡俗，又是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視角。儘管黃涵之的身份與宗教信仰與父親不同，但是由父親及其家庭生活環境，以及父母親的社交網絡依然會留下深深烙印。黃涵之的一系列施政慈善舉措深得民心，羅陽劉項宣曾贈言：

黃公乃相其緩急，苦心孤詣，力行勿稍挫。育嬰堂、廣濟院相繼建辦，訂立規章，盡善盡美。而復修先賢祠宇，以風厲薄俗；捐廉俸施醫藥，以全活災黎。整學校以閱教育，刊美書以敦孝弟，辦電話以利交通，促掩埋以妥殘骸。他如開水利，勸農桑，築橋梁，興實業。凡足造甌括民生幸福，諸鉅舉靡不次第興辦。一人提挈於上，各屬風從於下，一時吏治，幾有蒸蒸日上之勢。<sup>50</sup>

<sup>49</sup> 黃慶瀾《訓令龍泉縣知事整頓育嬰堂以救濟溺女惡俗文》，《甌海觀政錄》，第617-619頁。

<sup>50</sup> 黃慶瀾《羅陽劉項宣贈行序》，《甌海觀政錄》，第953頁。

第五，支持贊助紅十字會活動，擔當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會員。1904年，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初，黃涵之便隨父親一起向紅會捐款，1915年，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沈敦和稱其為“大善士”，<sup>51</sup>並在《申報》刊登謝辭：

中國紅十字會敬謝本會名譽會員黃涵之先生，捐助江西南匯災，振棉衣四百二百件。

本會名譽會員黃涵之君急公好義，於會務尤極贊成。茲以江西水災，南匯荒歉，當此嚴冬災民無衣無帽，何以禦寒？爰即大沛仁施，捐助江西災賑棉衣四百件，南匯災棉衣二百件。拜領之餘，莫名感謝，除分別彙解災區外，合亟登報以揚仁風。

上海二馬路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沈敦和啓。<sup>52</sup>

1916年安徽發生水災，黃涵之再次為紅十字會捐款。黃涵之其它慈善與佛教事業，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贅述。

#### 四、結論

本文聚焦於黃氏父子醫療慈善事業的代際傳承特質，試圖揭示二者在看似相似的行善模式與公益理念下，潛藏著深刻的信仰裂隙。黃春甫的醫療慈善活動始終植根於以教會醫院服務於上海

---

<sup>51</sup> 《中國紅十字會敬謝黃涵之大善士捐助江西水災賑款洋二百元》，《申報》1915年8月14日，第1版。

<sup>52</sup> 《中國紅十字會敬謝本會名譽會員黃涵之先生捐助》，《申報》1915年12月19日，第1版。

市群體民群體為核心的基督教網絡，其子黃涵之卻在以本土官紳為主導的佛教慈善界嶄露頭角，黃涵之更被譽為“民國時期上海慈善界僅次於王一亭的慈善代表人物”<sup>53</sup>，社會影響力顯著超越其父。然而，這對身處基督新教與佛教信徒不同信仰之間的父子，在宗教踐行與價值體系層面卻沒有表現出根本性的斷裂，由此引發出核心追問：在嚴謹的基督教家庭倫理框架下，為何會孕育出具有佛教領袖身份的慈善家？

那麼如何理解這種現象？本文試圖借助黃涵之撰寫的一段論述宗教與科學關係的文章，略作探討：

宗教之國，誠以人民為國家之要素，而宗教又為人之所以為人之要素也。歐美各國科學發達，已達極點。天知其為氣，地知其為土，雷知其為電。舉我中國舊時迷信各說，掃數破除，除國法外，宜無有足以為吾人之敬戒者。然猶倡為天堂地獄之說，以束縛人心者，蓋亦吾國向所謂迷信也。夫迷信之說何所自出，謂非出於宗教而何？古聖人神道設教，豈果以是愚民哉？……今日之中國，非事事步武，歐美各國乎。歐美各國之科學如此其發達，苟藉其科學之精巧，無論為奸盜為邪淫，其伎倆之高出於我國，必有相倍蓰者。而環顧各國人民之重公德，亦反相倍蓰於我國人民者，非有宗教以範圍之其能之乎？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竊以為，今日之心，百人中已死其九十有九，為揀亡計，自以揀人心，這第一要義。欲揀全國老幼男婦智愚賢不肖種種等類之人心，自以提倡宗教為第一要義。除提倡宗

<sup>53</sup> 陳姣燕《民國時期黃慶瀾慈善事業研究》（前揭），第34頁。

教外，若興教育辦實業等種種，亦不過一部分之補揀，而非全部分之補揀。猶為治標之補揀，而非治本之補揀也。昔年曾有倡議，以孔教為國教者，不敢附會其議。蓋孔子誠所謂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者誠以孔教為國教，恐但能為中人以上所信之教，而斷不足以語中人以下之人。欲合上智下愚，人人得以服膺其說而勿失者，自非佛教不可。佛教之理，可深可淺，其深者，上智之人足以參究；其淺者，即所謂迷信之說。是迷信之說，則中人以下，皆足以範圍之、使之，不敢放佚。公幸毋以迷信二字看作壞字也。迷信二字，實不連屬。迷即不信，信即不迷；以迷為信，雖信不真。去一迷字，乃能有信道之真。迷信本不可有，而真信確不可無。世人但知，迷信為愚，其實惟因其信之不堅，而終有執迷而不自悟者，是以謂之愚也。若一誠不變，信道篤實者，乃智者也，豈愚之云哉？所以人以迷信為不可有，我亦以為迷信不可有。……今則歐美各國近方提倡鬼神之學，不遺餘力，且有攝鬼神之影以破持無鬼之論者，是鬼神之學與各科學並立於世界之上，為最有關係之一種精妙學問矣。不過鬼神之學較各科學，尤為深妙，探索不易，故發明稍遲耳。然而積之愈久，則發之必愈切，其理可操券而得也。譬如百年以前，有以電燈電話之靈妙語人者，人莫不嗤其妄。今則交通各地，雖女孺皆神之說亦猶是也。人之所以不信者，亦以僅有理說而無事實以為證明之故。究鬼神學者日興，將來足以證明鬼神之事實者，必日多；而信鬼神之人，亦必月盛。是今日之不信鬼神猶百年前之不信電燈電話也，是仍在我人之智識。……且科學何所從出乎？則曰出之於哲學。抑知哲學何所從

出乎？則實出之於佛學也。故佛學不獨為科學之祖，實亦為哲學之宗。凡佛經中，足以為是二說之證明者甚多，不必精研細究也。第涉獵佛經者，即可知矣。昔者與公談而未暢，今者公將入國家之立法機關，為人民之代表，且又素信佛教者，故特為公詳之。<sup>54</sup>

上述長文清晰表明了黃涵之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對宗教與科學關係的認知。首先，黃涵之是一位有著堅定宗教信仰的佛教居士，他是從常理上思考宗教問題。其次，他是相信科學的，有著精深的西學思想，他完全理解西學和傳教士以聲光電化的科學術語批評中國民間宗教的態度。第三，對“迷信”的闡釋，他不認同傳教士將傳統宗教和文化習俗稱之為“迷信”，並將之與與“愚蠢”相對應的觀點，而以為“迷”和“信”要分而解之，他相信有堅定信仰的人，“乃智者也”，第四，他認為西方科學中存在着鬼神論，“鬼神之學較各科學，尤為深妙，探索不易”。若由歷史角度考察，當科學新發明出現時，人們總是持有懷疑態度，隨著新事物的發展纔會逐漸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那麼作為一門學科的鬼神論，並非沒有可研究之前景。第五，就科學與佛教之關係，認為佛教為科學的究竟根源。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實證科學在中國知識界逐漸確立認知權威，達爾文天演論和赫胥黎社會進化論等學說，與基督教傳教士傳播的西方科學知識形成合流，對傳統宗教宇宙觀形成的顛覆性挑戰，佛教面臨本體論危機，佛教“六道輪回”“業力因果”等核心教義，在基督教和科學實證主義框架下被斥為“迷信”。

---

<sup>54</sup> 黃慶瀾《致張君雲雷函》，《甌海觀政錄》，第252-257頁。

在此背景下，前有楊文會(1837-1911)等佛學改革者開始嘗試建立佛教與現代科學的對話機制，譚嗣同(1865-1898)的《仁學》則匯集了儒家、佛教、基督教和現代學科的諸種元素，試圖創建一個文化融合的新思想體系，後有王小徐的《佛法與科學》，論證佛法之科學。他們意識到，若不能將佛教納入現代知識體系，其生存空間將被科學理性徹底擠壓。然而，他們的論點在胡適看起來依然是“迷信”的。<sup>55</sup> 雖然，黃涵之的討論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但就“宗教”概念和“宗教與科學”之關係有著自己清醒而獨立的見解，他運用科學話術反駁學界精英關於中國傳統思想或宗教的“迷信”之說，賦於佛教以現代意義的普世價值觀。

如前文所述，黃春甫是近代科學和基督教醫療慈善事業的學習者、實踐者和推廣者，但因出身和學識的緣故，無法形成自己獨有的見解與思想，並在推動科學教育與慈善醫療本土化的過程中留下了深深的遺憾，未能突破“技術轉移”的層面。從學理上而言，黃涵之對宗教思想的理解，黃涵之要比父親高級許多。因為黃涵之的教育程度比其父親要高。黃涵之的優秀是黃春甫之精心培養的結果，這是否就是黃春甫對自己無法追求高質量的教育的一種彌補，黃春甫的遺憾在於他在西人世界沒有話語權，便讓子嗣回歸到本土文化圈，進入官場掌握話語權，這或是突破父輩困境的戰略選擇。這種代際轉型映射出更宏大的歷史進程——在民國初年民族主義勃興背景下，中國精英將慈善領域的主導權從基督教差會逐步轉移到本土宗教團體。黃涵之成功整合官僚體系與佛教資源，創建政教互嵌的慈善新模式，既延續父親引進的西式醫院管理制度，又注入佛教“慈悲濟世”的倫理內核，最終完

---

<sup>55</sup> 胡適《序》，王季同《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第VI頁。

成慈善本土化的話語置換。

值得注意的是，黃涵之的專業實踐呈現出耐人尋味的雙重性特徵：在醫學領域，他既推崇科學實驗精神又倡導中西醫匯通，20世紀初期，肺病成為危害人類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黃涵之注意到歐美各國均設有專科醫院應對此疾，“肺病為世界人類之大敵，吾國衛生程度幼稚，病後復調理不善，以致蔓延日廣，為害無窮。……歐美各國、無不注意此點，即以德國而論，其地僅如中國四川一省之大，而肺病療養院，乃多至一百餘所。今我國肺病之多，甲於各國，而療養院猶寥若晨星，殊為闕憾！”<sup>56</sup>1928年，他在上海創建肺病療養院，聘請中西醫生參與管理與治療，醫院“特備德國愛克司光線機、高山太陽燈、電光浴室、日光浴場等物理的療法以外，並施行人工氣胸術、肋膜穿刺術等最新手術，及注射各國專門治癆藥品。”同時醫院還“復採用吾國治肺有效之經驗古方，以為佐助，俾藥物之功能，藉天然之療養而益彰。”<sup>57</sup>在社會改革層面，其對封建陋俗的批判力度與基督教傳教士如出一轍。這種技術理性與進步思想的養成，實則源自其父執業時建構的現代醫療體系與西式教育背景。由此可見，黃氏父子的代際傳承並非簡單的信仰斷裂，而是在現代性轉型過程中，基督教倫理通過世俗化路徑實現的創造性轉化——宗教符碼雖被剝離，但其人文關懷與實踐理性卻以新的文化形態得以延續。

最後以黃涵之的“勸說自殺”一段文字作為結束，以此展現黃氏父子間精神與信仰的代際傳承：

大家不要想我是信佛的人，所說的話都是迷信的，

<sup>56</sup> 《肺病療養院之緣起簡章》，《申報》1928年5月14日，第15版。

<sup>57</sup> 同上註。

請你們不要這樣想。一人死了，一定要投生的，不會就完結的。因果報應的事情是一定有的，有憑有據的，不可以不相信的。那些造大罪業的人，恐怕苦人身還投不到，要投畜生理。講到自殺有罪業的話，也是一定的道理，不獨是佛教這樣說，就是儒教、道教、耶穌教、天主教都是這樣說的，若是你們不相信可以去問各教的人。<sup>58</sup>

---

<sup>58</sup> 黃慶瀾《勸人勿自殺文》，《申報》1928年11月21日，第16版。